马尔克斯:为卡斯特罗画像(上)

◆ 加西亚·马尔克斯
蔡天新 译

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·卡斯特罗的传奇一生落下帷幕。2014年去世的著名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生前与卡斯特罗私交甚笃,在他的笔下,卡斯特罗不仅是一位政治家,更是“一个质朴的男人”,是“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”。

■ 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

一位孤独的漫游者

有一次,菲德尔·卡斯特罗陪伴一个外国访问者在古巴游览了一个星期以后说,“简直不可思议,那家伙居然比我还会说!”可是,任何对菲德尔·卡斯特罗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,这种说法夸大其词了,绝对夸大其词了,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比他更喜欢演说。

他对词语的嗜好几乎入了魔。在革命初期,凯旋进入哈瓦那没有几天,他曾在电视上连续演说了七个小时。那一定是个世界纪录。开始几个钟头,哈瓦那的听众还不熟悉他那有着催眠力的嗓音,坐下来认真听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,只用一只耳朵听他的演说,另一只耳朵用来做别的事。

我刚好在此前一天随加拉加斯的一个新闻记者代表团抵达,我们是在下榻的旅店开始听他演说的。没有任何停歇,我们走进电梯,坐出租车去商业区,在盛开鲜花的咖啡馆里,或在有空调的酒吧里,直到在大街上漫步,收音机里的高音仍然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。夜晚来临,我们完成了计划中的行程,没有漏过一个词语。

有两件事引起了初次聆听菲德尔·卡斯特罗的人的注意。一是他对听众有着巨大的诱惑力,二是他嗓音中的脆弱成分。那是一种嘶哑的嗓音,时常蜕变成喘息的耳语。有一位医生听过以后得出结论,即便不进行这种马拉松式的演说(他把它比作亚马逊河的流水),菲德尔·卡斯特罗也会在五年内失声。不久以后,在1962年8月,这一诊断似乎得到了可怕的证实,在宣布美国公司国有化的一次演说中的他的嗓音哑了。但那只是一次暂时的挫折,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。二十六年过去了,菲德尔·卡斯特罗已经年满六十一岁,他的嗓音依然像从前一样难以捉摸,依然是口语的精细工艺中最有价值和最不可抵御的仪器。

对菲德尔来说,一次演说平均需要三个小时。换句话说,他一下子能把时间推进三个小时。由于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的领袖,宁愿在现场解决一些问题,人们可以看见他不事张扬地坐在小汽车里,没有吼叫的摩托车队的陪伴,悄悄地出没在哈瓦那僻静的街道上,甚至在黎明前夕来到荒郊野外。这些故事都添加到他的传奇中去:一个孤独的漫游者,出没无常的失眠症患者,会在任何时刻拜访他的朋友,让主人彻夜无眠。

在这层外表下面有他早期革命的经历,那些从马埃斯特腊山保留下来的习惯。他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固定的家和办公室,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日程。过去,政府的所在地随他而迁移,权力本身也依赖于他的漫游带来的契机。如今,情况可不一样了。他仍然保持极端鲜明的个性,同时,也使生活多了一份秩序。从前,任凭白昼和黑夜流逝,只有当疲倦之意袭来时才会获得片刻的休息。现在,他努力让自己有六个小时不受打扰的睡眠,尽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就寝。这一点每天都有所不同,可能是晚上十点,也可能是早晨七点。

每天他要花上几个小时在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,那儿有一张井然有序的写字台,未套皮革的舒适的沙发,还有一个藏书架,反映出主人广泛的兴趣:从水栽法的论文集到传奇故事。他从每天抽半盒雪茄到彻底的禁烟者,只是为了树立道德的权威,在这个克里斯朵夫·哥伦布发现烟草的国度,至今它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
在谈话中得到休息

过分的放松促使他的体重增长,从而开始永远的节食。这是一种痛苦的牺牲,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胃,对搜集菜谱有着永不满足的贪婪之心,甚至抱着某种科学的热情。有一个星期天,他放纵自己,一顿午餐就吃下十八筒冰淇淋。不过,通常他只需一块鱼片和煮过的蔬菜,没有固定的进餐时间,什么时候饿了才吃。他的体格一直非常棒,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做体操或游泳,限制自己只喝一杯威士忌,并且是小口地品尝。他还放弃了对意大利空心面的钟爱,那还是教皇的第一个使节教他做的。他的荷马式的暴怒已成为过去,如今学会了用坚毅的耐心驱散灰暗的情绪。

简而言之,这是一条铁的纪律。可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够坚定,考虑到不可避免的时间上的冲突,无法把一张设定的日程表强加给他,他的想象力使其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不受约束。和他在一起,你知道从何时开始,却不知道到何时结束。每一个夜晚你都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在一架飞机上,去往一个秘密的目的地,成为一场婚礼上最受欢迎的人,到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捕捉龙虾,或品尝卡马圭刚烘出的法国奶酪。

很久以前他曾说过,“与学会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情是学会休息”。可是,他休息的方式非常特别,甚至谈话也包括在内。当他在午夜时分结束紧张的工作,疲倦之态尽显,他会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,然后在黎明到来之前恢复了体力。私人的聚会不合他的口味,因为他是古巴人中难得不会唱歌跳舞的。他也是少数几个能够改变聚会气氛的人之一,或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会迅速占有整个空间,尽管他实际上并不如初看起来那么高大魁梧。我曾经目睹他的存在使得那些极其自信的人不知所措,只好假装显得镇静或自傲夸耀,并努力使这一点不被人注意,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别人一样可以亲近。我一直相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词“多一性”,他用来描绘自己的行为,并不像它表面上显示出的那样威严,而是诗意地隐藏起内心的羞怯。

终于,跳舞中断了,音乐停止了,晚宴结束了,人们聚拢在他周围,一场演说又开始了。他能长时间地站着,不吃不喝。有时候,他会在睡觉前敲响一个好友的家门,事先没有任何通报,说自己只逗留五分钟。他说得那么诚恳,甚至不坐下来。可是,渐渐地,他受到话语的刺激,不久便瘫坐在椅子上,跷着脚说,“我感觉自己很清醒”。那就是他的方式,厌倦了谈话,却又在谈话中得到休息。

杂技好男儿程海宝

陆林森

17.在改革洪流中

1977年10月,上海人民杂技团正式改名为上海杂技团,恢复了高空大型杂技和马戏驯兽节目表演。上海杂技场,也回归“本我”,恢复演出杂技节目。两年后的7月14日,上海杂技团改组,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复上海市文化局,王峰副团长提任团长。

从南到北,由东及西,中华大地,改革潮涌动,上海杂技团开始走上了艺术复兴之路,出现了难得的演出小“高峰”,就在王峰走马上任两个月后,杂技团赴山东演出,刚刚落成的山东体育馆内座无虚席,热情的山东观众迎来了上海杂技团马戏队,精彩的演出让观众们为之一叹:真是大饱眼福啊!第二天,山东省报《大众日报》在显著版面发表《精湛的技艺,独特的风格》一文,盛赞上海杂技团马戏队的演出“非常完美,做到了精心设计,层次分明,衔接自然……演员娴熟自如的技巧,优雅健美的艺术造型,大大发挥了杂技艺术的感染力”。

程海宝置身于改革洪流,越来越忙了。练功、演出,带领二队走南闯北,一年四季,他将大半时间用在了节目的编创演上,即使回到家,也常常是“至不暖席”,心里想的仍然是演出、演出。从1981年开始,他带领演出二队巡回演出,近的地方如江苏、浙江,远的则为湖南、广西、四川等地,一路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程海宝和杂技团有个约定,多演出,多创收,将优秀的杂技节目送往各地。经济上,二队和其他两个演出队以及魔术队,都进行独立核算、分灶吃饭,奖勤罚懒,多劳多得,演员们的演出热情分外高涨。程海宝崇尚简朴,对于多劳多得,他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,演员们辛辛苦苦地演出,挣来的奖金是光荣的,属于集体,也是属于大家的。所以,使用时应该秉持节约原则,能省则省,能不用尽量不用。总之,不能乱花一分钱。每次去上海市外演出,他总是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图,选择最经济的旅馆,甚至和队员一起去打前站,为演出做好充分准备。住旅馆好是好,可是费用太贵,他不舍得花,宁愿在演出现场,在舞台后随便搭一个地铺,将就将就,将省下的钱用于演出、再创收,最大限度地增加队员的收入。

1980年到1990年,这是上海杂技团最引以为傲的“黄金十年”。仅杂技团在上海杂技场的演出,就刷新了历史纪录,每年接待的观众高达40多万人次,其中,外宾占绝大多数,约占全部观众人次的70%到80%,包括各国政要和高层次访沪代表团、经贸人员、旅游客和在沪专家以及各国留学生。人气爆棚的上海杂技,被誉为上海对外交流的一张文化名片,对于弘扬中国的民族杂技艺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许多外宾观赏了上海杂技,热情地为之牵线搭桥,促成了上海杂技走向国际社会,启开了上海杂技团走出国门进行商业演出的大幕。

10年间,杂技团北上南下,对内对外,商业演出活动频频。1983年4月26日,杂技团马戏队赴京公演,这是20年后上海杂技团的首次与北京观众见面,演员结构和节目都已发生了变化,为期10天的公演,一共演出了21场,引起了轰动。《北京晚报》发表文章说,上海杂技团“不仅使首都观众大饱眼福,而且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在京同行、专家们的赞扬,高度评价该团不愧是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艺术团体”。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阿良看了演出,发表评论说,上海杂技团的表演有三个突破:“音乐演奏有突破,艺术表演上有突破,技术上有突破,有上海独特的风格。”

这10年,也是程海宝带领演出二队,在演艺市场大显身手的“黄金十年”。“文革”,使程海宝这一代青年杂技演员失去了很多,然而,他们没有沉沦,而是抓紧时间自我修炼,校正人生坐标,认准了中国杂技,一步步走向艺术成熟。

程海宝、周良铁、张训导、蒋正平等一批青年演员,频频亮相于国内国际赛场,鲜花,映红了他们的脸庞;掌声,淹没了练功房内的喧嚣和嘈杂之声。他们,将中国杂技舞台上曾经的荒芜,远远地、远远地摔在了身后,向着一片新生的杂技绿洲奋进。

追寻

——『铁笼沉湖杀人案』侦破纪实

孙侃

2.老板被人带走

铁证已被找到的大好消息,在第一时间从青田传到了杭州,传到了密切关注打捞进展的下城区公安分局和上级有关部门。下城区委常委、公安分局局长郑洪彪再三叮嘱专案组:在确保万无一失的前提下,尽快把这一关键证据打捞出水!

2015年1月6日,铁笼打捞开始。因铁笼沉在水下已有多时,铁笼门也处于半敞开状态,加之水下情况复杂,打捞存在一定难度。专程赶到现场的郑洪彪局长和巢震宇副局长等领导全程指挥,及时决策打捞过程中的诸多环节,化解难题。当晚7时许,夜色里,众人热切的目光中,铁笼被起吊器渐渐吊出水面,最后稳稳落在工作船上……

由此,失踪920多天,且已在水底下沉了840多天的被害人被找回,下城区公安分局完成了全国公安史上难度最大、足以载入刑事侦查史册的深水打捞!此时,距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庭审时间已不足1个月,离向检方提交关键证据的最后时限仅剩4天!

艰难曲折的铁证搜寻终告成功,这起大案的来龙去脉发人深省。让我们回到案件的起点,细细追述这篇公安干警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、比拼意志的传奇故事吧。

“快去救救我的老板!”2012年6月11日,天刚蒙蒙亮,一名李姓小伙子神色焦灼地走进下城公安分局武林派出所,说自己的老板张宏昨晚被一伙人带走了,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音讯。他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,老板与一个名叫胡方权的温州人有巨额债务纠纷,很可能已被这姓胡的非法拘禁。

接警的民警仔细听完,一边已在细细分析:报案者所讲的究竟是真是假?在民间债务纠纷案中,尽管有时会发生谈判破裂而惹出拷打、拘禁之类的歹事,但有时也会以居间调解、互相退让等方式化解僵局,握手言欢;有的还会在重新和好后,好好嘬一顿乃至玩个通宵。这回会不会又是一场虚惊?

“我说的全是真的!我们老板肯定被他绑架了,这个胡方权是个敢下毒手的人!”因为心急,李姓小伙子的回忆有些语无伦次:张宏在昨晚7时20分给他发来过手机短信,但只有温德姆酒店这几个字,别的什么内容都没有,这说明那边的情况不允许张宏说得更详细;昨晚11时他又接到张宏妻子的短信,说那伙人向她索要5000万元巨额赎金,声称见钱放人;张宏妻子通过各种关系想与对方商量,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,一点让步的意思都没有。如果真是这样,那便是一起典型的因债务纠纷引起的非法拘禁!武林派出所接警后,马上派出民警前往该酒店侦查。

下城区凤起路与环城西路交叉口,距景色怡人的西湖景区仅一步之遥的地方,一座富丽堂皇而又风姿绰约的高档酒店矗立着,这便是杭州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。进入酒店,查看现场,询问证人,调取并查看酒店监控视频……民警们的侦查从该酒店开始,对于事发时的那段视频尤其关注,几乎逐格查看。

视频显示——6月10日晚6点30分左右,一辆奥迪Q7轿车出现在酒店大门口,挺着啤酒肚的胡方权从轿车左后座内走出,张宏从右后座下车,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通往酒店客房的电梯。57分钟后,胡方权与张宏乘坐另一辆奔驰A8轿车离开酒店。此时的视频里,胡方权身边又多了一个身穿花衬衫的男子,似乎是他的马仔。

民警还清晰地发现,视频中,张宏跟随胡方权和花衬衫男子走出客房,脸上的表情似乎比进入酒店时更为放松,还主动向胡方权搭话,但胡方权没接他的话茬儿,只是摇晃着将军肚,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酒店。但不论怎样,监控视频中没有胡方权对张宏施以暴力、控制人身自由等行为。

难道真是一场虚惊?查看了监控视频的民警没有简单地将此事放过,而开始了对胡方权初步的案底调查。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,原来此人是个有案在身的人——有赌博、非法持有枪支、寻衅滋事等多次违法犯罪前科,并因流氓罪、赌博罪两次被判刑,张宏事件发生时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。顿时,民警们的职业警觉性被调动起来——遇上的极有可能真是一起刑事案子!而尽快查清张宏的下落,即成为众民警最大的关注。